

临高语 | 弱势中的“强大”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刘剑三



临高县生活着5万操临高语的疍家渔民。

因为谐音 而一地多名 “美兰”之名七度变脸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刘剑三

翻开海南地图或者海南与地相关文献书籍,总会看到一些同一个地方有多个名称的现象,比如美兰机场名称缘起的村子,有“美蓝”“美兰”之殊,博鳌亚洲论坛的所在地,更有“博鳌”“博鳌”“卜鳌”“博傲”之异。人们对此往往是一头露水,莫明其由。其实,这种由同音或近音的谐音关系形成的一地多名,是临高语地名一种经常出现的现象。

临高语是一种非汉语语言,没有自己的文字,地名多为汉字音译。由于汉语同音近音字多,同一个地方不同时代可能用字不同,同一时代不同的人也可能用字有别,导致一地多名比比皆是,就笔者所见,一地三名就有不少。如文昌的迈号,嘉靖《广东通志》“琼州府”的“驿铺”下写作“迈号”,雍正《广东通志》“琼州府”的“驿铺”下写作“迈候”,咸丰《文昌县志》卷一“舆图”上写作“美号”;澄迈县福山镇海边有个花场村,原来是一个墟市,《正德琼台志》卷十二“墟市”下记作“墟场”,嘉庆《澄迈县志》记作“头昌”,光绪《澄迈县志》卷二“都市”下记作“花场市,旧名头昌”,道光《琼州府志》不了解地名的变化情况,卷九《建置志五·都市》下“头昌市”和“花场市”并收。

一地四名的也有一些,前面提到的“博鳌”的异名就是如此。

而以“美兰”的异名为最多。该地名源于一个驿铺,最早见于《正德琼台志》,该书卷十四“铺舍”中写作“梅蓝”,康熙《广东通志》琼州府“驿递”和康熙《琼山县志》卷一《舆地志》袭之;乾隆和咸丰《琼山县志》疆域志(舆地志)均作“迈蓝”;民国陈献荣《琼崖》第五章交通之“公路”下写作“美蓝”;民国《广东通志未成稿》之海南“公路”下作“美男”;民国陈铭枢《海南岛志》“海南全岛公路图”上写作“美南”;测绘出版社1995年《海南省地图册》写作“美男”;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10年写作“美兰”。其变脸竟有7次之多,令人眼花缭乱。

临高语地名虽一地有多名,但没有一种书写形式能揭示地名的来历,地名的来历只存于语音即口语当中,书写形式只是一种视觉符号,与地名来历无涉。这是所有非汉语地名和汉语地名的根本区别。图

语言有强势弱势之分,当今海南各种语言方言中,普通话以其官方语言的身份稳坐“龙头老大”的地位,海南闽语虽然人口高居全省大半却屈居其后,其他更只能殿在二者之后。语言是用来交际的,在一个多语杂居的地区,交际语言可能随着交际场所不同而有所变化:在家庭里面和同一语言集团之间,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自己的母语,但在社会公共交际场合,如在集贸市场交易和到政府部门办事,要跟不同语言集团的人交流时,只能使用彼此都懂的语言。

由于强势语言的操用者往往不太愿意去学习相对弱势的语言,而弱势语言的操用者为了交际的需要,却不得不去学习强势语言,因此,强势语言就自然而然成为不同语言集团社交场合的共同交际语。其结果,弱势语言由于使用场合有限,在强势语言的四面围攻之下,就会逐渐萎缩,乃至最终灭亡,满语由曾经的辉煌到现在的式微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

然而,这样的情况在临高县境内的临高话身上一直没有发生,相反,作为岛上的一种弱势语言,它至今依然坚挺,不仅没有萎缩,反而在不断扩大自己的“领地”。

临高县建于隋炀帝大业三年(607年),是岛上建县历史较久的县份之一,也是岛上县名1300多年保持不变的少数几个县份之一。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,全县总人口为427873人。该县是“临高人”最集中的地方,在这里,临高语势力很强,一支独大,就像一个大熔炉,不管哪个语言集团,不管来自何方,不管是官员、商人还是经营其他行业者,为了交际的需要,定居下来之后都不得不学临高话,只要进入该县两三代,都要被其“同化”,几乎无一例外,即使他本人还顽强地讲自己的母语,但到了第二代,一般都会讲一口道地的临高话。由于人多势众,他们不太愿意去学母语以外的其他话,除极少数人外,一般人只会讲本地话,而其他语言集团为了交际的需要,定居下来之后都要学临高话,因此,从农村到乡镇到县城,临高话几乎成了集贸市场交易唯一的交际语言,作为“龙头老大”的普通话只能屈就在县里开会和城镇教学用语上。

对闽人和客家人的影响

从该县居民成分看,除了“临高人”还有其他语言系属的居民。据1980年统计,讲临高话的人占了该县总人口的91.6%,这就意味着,还有8.4%的居民不是“临高人”,其中主要是闽人和客家人。闽人落户临高者大部分是利其山水过来的,县南部就有来自潮州的几个村子。他们来到临高后,长期与“临高人”打交道,基本上都学会了临高话。加来镇有个叫美塘村的村子,其祖先是400多年前从广东丰顺迁来的,现在已经发展到600多人,尽管第一语言还是母语,但都通晓临高话,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,临高话都说得跟本地人一样溜,单从他们所讲的临高话上根本无法识别其身份,只有通过风俗习惯才能分辨得清。闽人擅长做生意,落户临高的闽人还有一部分是辗转过来做生意的,主要集中在县南部的加来、和舍、多文、龙波等墟镇中。由于当地临高话势力太强,他们自己的母语一般只在家庭和本族群内使用,尽管他们就生活在镇上,但在集贸市场交易里也很少派上用场。有些地方年轻一代甚至更习惯讲临高话而不愿意讲母语,久而久之,就把母语也给忘了,老一辈经常为此抱怨,但也

无济于事,临高县城就是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。县城迁到今址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,作为全县最大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,临高县城原来有不少从各地来闽海的闽人,但现在已经很少人会讲自己的母语了。

海南的客家人上岛比较晚,现今居民人数远比临高人少,其所操用的语言即客家话更是处于弱势。据古小彬所著《海南客家》,客家人成批上岛是乾隆十八年(1753年)朝廷发布《敕开垦琼州荒地》命令以后的事。由于当地人多地少,一部分居住在广东省肇庆、嘉应、潮州、惠州地区的客家人,越海迁居于本岛。由于来得比较晚,岛上比较好的地段已被上岛较早的语言集团占有,客家人只能选择在山脚部位居住,开山垦荒。客家大部居于本岛西部,其中包括临高的兰洋与和舍。解放初期兰洋已割给那大县(今儋州市),现今临高县内的客家人主要集中在和舍的几个村,包括槟榔山、荔枝山、四门寮、加龙井、龙潭等。这些村落的居民除母语外,全通临高话。在汉民族各种语言集团中,客家人漂泊性最强,经常颠沛流离,由于担心远离故居后子孙忘记祖宗创业之苦,老一辈都希望后辈能守住自己的语言,试图通过母语的传承把祖宗宗功维系下去,因而有“宁卖祖宗田,不忘祖宗言”的美誉。但是,在临高这方土地上,面对远比它强势的本地语临高话,根本无法阻挡,这些纯客家后裔的村落,很多人已经被临高话同化了,他们被临高语同化的程度比闽人还要深,如四门寮的中青年根本不会讲客家话了。

对新移民的影响

以上所说的闽人和客家人,都是有明确的非“临高人”的身份标识的。事实上,如果追溯历史,现今被认定的“临高人”,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原来也不是“临高人”。这里面最典型的是谢渥的后裔和“临高人”地区的疍民。

谢渥是临高县迁县治于莫村(今县城)后的首任县令,南宋福建晋江人,在任期间重教兴学。绍兴十八年(1146年)胡铨被贬吉阳军(今三亚)路过临高时,曾被延请到茉莉轩讲授春秋大义,传播中原文化,在临高留下了千古佳话。卸任后举家定居临高,他的弟弟也全家来临高落户,

今其后裔仅临高就有好几千人,散居在官位、多璉、兰堂、敦礼、和丰、拜溪、和逢、龙浪等村庄。

想当初,谢渥兄弟两家到临高时都应该是讲闽语的,而且还可能坚持了好几代,但终于守不住,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他们的后裔把自己的母语彻底忘掉,而把临高话当成了自己的母语。

谢渥兄弟两家的“蜕变”只是家族式的,“临高人”地区疍民的“蜕变”却是整个群体。疍民是人们对以船为家、靠打鱼谋生的水上人家的总称,据正德《琼台志》,明正德年间海南登记在册的疍民为1913户,“临高人”地区共556户,占当时疍户总数的28.8%。临高县海岸较长,港汊密布,当时疍民有221户,主要集中在现今县西北部新盈和调楼两镇的沿海地带,该地区的中心集市新盈墟临高话就叫做“喊”(“疍”的临高话读音)。早期疍民基本上以船为家,居无定所,但明代临高人王佐(1428—1512)《鸡肋集》中就出现新兴、黄龙等聚落名称,还以黄龙村为题写下了《黄龙观海》和《黄龙夜宿》两首诗,据此,临高境内明代就有疍民上岸定居了。王佐诗文中的新兴、黄龙,至今名称依旧,都是疍民聚居之地,前者是一个拥有近万人口的中心集市,后者也是一个将近几千人的著名渔村。

现今疍民这个群体仅临高县就有5万人,如果把原琼山和澄迈的“临高人”疍民也计算在内,估计将近10万人。一般认为,海南的疍民是从珠江口迁徙过来的,他们原来应该有自己的语言。据了解,现今岛上三亚市的榆林港、南海及藤桥渔业村,海口市捕捞新村、捕捞旧村和白沙门下村,陵水的新村港,昌江的昌化港都在使用一种被称为“疍家话”的语言,但“临高人”地区讲的却是临高话,显然,这些到“临高人”地区的疍民,后来都被“临高人”同化了。这么大的一个群体被同化,完全融合到“临高人”当中,从其他语言集团变成真正的“临高人”了,说明临高话的势力是多么强大。这也足见现今的“临高人”不是一个单一的语族群,而是在不断融合其他语族群扩充壮大起来的。

其实,我们说临高语是一种弱势语言,是就现在的情况讲的,历史上它曾经是岛上最强势的语言,这种地位,可能维持到闽人大规模上岛成为岛上居民的主体之后才结束。图